

CHINESE STUDIES ABROAD EDITORIAL BOARD
國外



中國學研究

譯叢

• 2 •

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

李范文 陈奇猷等主编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大街98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1 字数: 412,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225-00044-6/I·4

定价: 3.50 元

國外中國學 研究譯叢

樣初題



目 录

城市研究

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

..... [美] 施坚雅 (1)

余苇青 王东生 译

哲 学

从比较思想的研究方法出发研究朱子.....

..... [日] 汤川敬弘 (59)

刘华兴 译

经 济 学

康熙十五年丈量苏州府长洲县鱼鳞图册的田土统计考察.....

..... [日] 鹤见尚弘 (81)

姜镇庆 译

业食佃力考..... [日] 滨岛敦俊 (123)

陈柯云 译

文学与艺术

中国最后一部古典小说

——论《老残游记》的境界和结构... [美] 林顺夫 (164)

耿百鸣 译

明清时代的书法特点..... [日] 中田勇次郎 (190)

郑丽英 译 孙智华 校

古代史研究

法家以前

——春秋时期的刑与秩序……………〔日〕棚山明（197）

安莉芬 译

孔智华 高伟民 校

战国时代秦国的都官

——主要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探讨……………

……………〔日〕工藤元男（235）

陆 忠 译

朱和生 校

后汉选举中辞退推举现象探原……………〔日〕福井重雅（253）

曹庆强 译

戴云峰 校

近代史研究

1853—1854年的太平天国与列强……………〔日〕林建朗（269）

高培明 刘野农 译

唐洪林 孙智华 校

民族史

室韦人是蒙古人吗？……………〔法〕保罗·拉切夫斯基（303）

耿 升 译

中外文化史

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亚美尼亚人……………〔法〕多维耶（332）

耿 升 译

民族学

公元三——四世纪散居在中国内地的少数

民族和他们的社会结构……………〔苏〕L·N·杜曼（353）

郑静云 译

徐富强 校

社 会 学

- 四川人口情况的地区性变化……………
……………〔美〕G·贝涅特 G·罗兹曼(379)
陈家泽 译

宗 教 学

- 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宗教形式……………〔法〕戴密微(390)
葛 胜 译

道、理与法

- 黄老之学中的三个关键性概念…〔美〕冉云华(423)
周 宁 译 金起元 校

西 藏 学

- 藏文历史文献中的“掘藏”(gter-ma)……………
……………〔苏〕沃斯特里科夫(439)
王青山 译
- 藏文的da drag……………〔法〕J·普兹鲁斯基(458)
M·拉 鲁
冯 蒸 译

古籍研究

- 《史记》的作者群……………〔日〕泽谷昭次(463)
詹 勤 译

人 物 志

- 顾颉刚的最后三十年……………〔美〕厄休拉·里克特(487)
郑欣龙 译
- 列夫·托尔斯泰和孔子……………〔苏〕A·谢夫曼(497)
周均美 译

- 法国汉学家罗贝尔·戴何都…………… 张珠圣 译 (515)
- 试论清初重要的诗人兼人类学家吴嘉纪……………
- …………… [美] J·查维斯 (517)
- 张 澈 译
- 访西夏学学者李范文…………… 王枝忠 译 (525)

青海集锦

- 《格萨尔王传》中的“霍耳”…………… [法] 石泰安 (529)
- 耿 冯 译
- 南国与南语…………… [日] 北村甫 (533)
- 冯 燕 译

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

〔美〕施坚雅

余英青 译

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口中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是多少？本文试图从这一假定——这一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必须要有相当精确的指定——着手来予以回答。在时间这一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十九世纪，其特定的目的则是推算出1843年1893年这两个相距五十年的年代的人口估计数。在空间这一方面，我这里所持的看法是，在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

区域研究法

在我对中国城市研究的相当早的时期，情况就明了了。在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并没有构成一个单一的、合全国城市为一体的城市系统，相反，它们形成了几个区域系统，每个系统只同其相邻系统保持着微弱而稀少的联系。在把这些区域系统中的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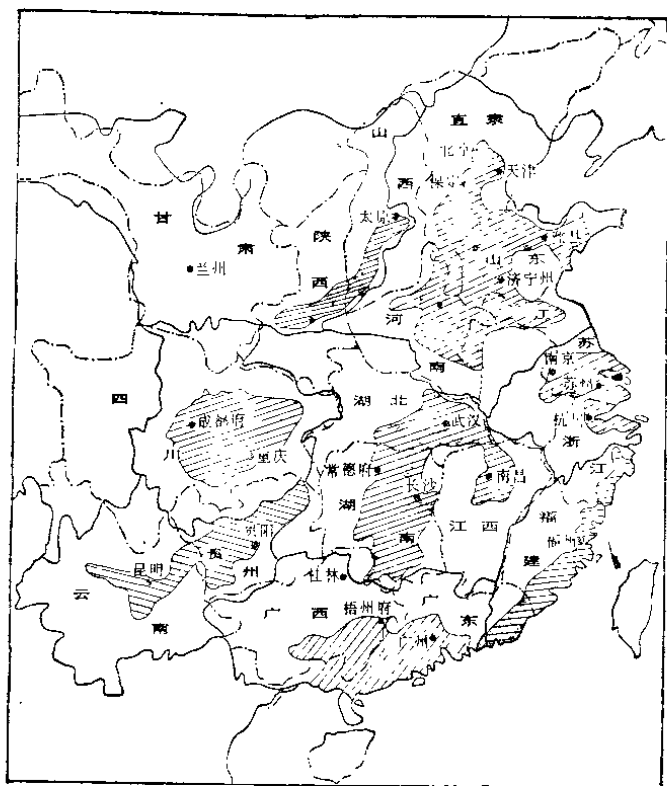
^{*}原文题为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译注

间相互重迭腹地——描绘出来的过程中，我开始注意到由这些腹地联合构成的区域，都毫无例外的同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相吻合。简言之，似乎各个城市系统都是在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之内发展起来的。我最终开始把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增长——视为区域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谓区域发展，指的就是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据以较有效的增殖、分布、及不断进一步有效地加以开发的过程。

在君主时代，各区域之间，不仅在天然的或潜在的资源上，而且在发展过程的时间和性质上，都是相互为异的。正如各个区域迥然有别一样，构成各区域之骨骼框架的城市系统也自有特色。由此可以预期，城市化的程度及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特征也是系统地表现出此一区域与彼一区域的差异。因此，我便分区域安排了各个城市的数据，从区域发展的背景中追溯城市的历史，并就各个自然地理区域分别剖析了城市化的过程。

地图1①描绘了第一级的区域单元。这些单元无一例外地都以汇水盆地为其界限。所有区域边界（除了在分水岭穿越河流的个别地方之外）都循分水岭而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区域边界都是循着山脉山脊而走的。在确定区域边界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首先，当巨大的水系跨越两个以上的区域时，将在沿干流河道哪一段上划定分界水算准确？其次，不外泄的内陆河流及沿海的小水系将归入哪一区域？解决这些问题的标准，就必然要从运输效率和贸易流以及自然地理本身中寻找。

这九个区域实质上囊括了整个中国农业区。即帝国境内中可以经营中国人传统上从事的定居农业的那部分。在西部地区，区域的边界把六条河流上干旱且又不那样适于定居的上流区域划了出去。地图1示出了这一划分的起始河段。云贵区域是境内实质



地图1 中国农业区的自然地理区域及主要水系，阴影部分为区域核心。

上没有什么可通航的河流之地，所有官方和商业的运输都取道陆上的高原，其边界划定得使其能把红水河（西江的支流）、巫江（长江的支流）和金沙江（长江上游河段的名称）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其起始河段是自接近这三条河流连小船都不能通航的地点起算的。

至于其它各区域，边界的划分是容易的②。岭南区域就是由西江、北江和东江构成的流域盆地。东南沿海区域由无数从武夷山入海河流的流域所构成。长江下游区域的核心地区是在有关中华帝国文献中饮誉甚多的江南鱼米之乡，该区域包括钱塘江流域及其它注入杭州湾的河流。长江中游区域含汉、赣、湘、沅四条主要支流的广阔流域。长江上游区域则有富饶的四川盆地为其核心。很大部分上由黄河上游流域构成的西北区域，则照惯例予以扩大，以将河西走廊上的几个重要绿洲所座落其间的内陆流域也兼括在内。华北区域包括黄河下游流域加上淮河、渭水以及蜿蜒在华北平原上的许多较小河流的排水地区。

我将把中国农业区的第九个区域满洲完全略去不予分析。犹如这整本论文集对它都未加触及一样。其主要原因是汉族人在本区域内大规模的定居仅在清代最后几年中才开始的。在1890年代前，满洲还是极为落后的，它的城市系统仍处于胚胎阶段，或者至多刚刚萌现。至于那些使它变成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区域的迅猛变化，则都是二十世纪的发展了。此外只是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正规的地域行政文官系统才延伸到满洲。因此，该区域不可能象其它八个区域一样，依照1893年的行政官阶品秩来划分城市的类别。所以，我的分析只涉及除满洲以外的中国农业区，其面积大体上近似于清代中国传统的“十八省”③。

这里讨论的八个区域，尽管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是相等的，但它们决非等大。表1示出了1843年和1893年各区域的近似面积、

估计人口密度（也列入了1953年的数据，以资比较）^④。各区域在面积和人口上的差异，为由该区域的资源所“支撑”的城市等级中任何一个特定级上城市的数量所反映。换句话说，为要在一个特定级上发挥区域中心功能所必不可少的数量所反映。东南沿海区域只有一个都市，而华北则有七个都市，处于另一极端（至于这一类的城市——它们起着高级的中心功能——的重要性，参见我的《中国城市及地方系统的等级》一文）。

在人文地理中，区域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依照下列标准中一个或两个面定的活动空间的区分，其标准是：（1）研究对象的相似性——由此导出一套完整的、相似意义上的区域；（2）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由此导出一套功能作用或纽结意义上的区域。我们刚才所定义的区域是第二种类型。假如地图1.对大多数读者显得新奇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已惯于按照相似性标准划分的区域；这种划分法导出了相似性意义的区域，不管对象是土壤、气候、农业，或是人种，我们都可以按其相似性划分区域。与按相似性划分的区域相反，按功能作用划分的区域之间从内含上讲是不同的。它们构成了这样的系统——在其中许多活动都按功能上的不同而相互作用着的系统。在这里所论及的中国的区域中，城市是这些区域的纽结，是用以在时间和空间上连接人类各项活动并使其成为一体的“指挥所”。

现在我们可以从大体上解释这一事实：在各个区域中都发展起了一个相当分立的都市系统，即形成了一个城市间贸易聚集于此，而其城乡之间的贸易则又以该区域为范围——遍及但不超越这个区域——的城市群。各种资源——在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是可耕地，当然也包括人口和投下的资金——在一块中心地区的逐渐集中，在边缘地区，这些资源却日渐贫瘠，这是每个区域的共同性质，我们将从此着手开始分析。如我在《中国城市与地方

表1、中国农业区的宏观区域（不包括满洲）：面积、

估计人口和人口密度（1843年、1893年和1953年^a）

宏观区域	面积 (平方公里)	1843年		1893年		1953年	
		人口(百万)	密度	人口(百万)	密度	人口(百万)	密度
华北	746,470	112	150	122	163	171	233
西北	771,300	29	38	24	31	32	42
长江上游	423,950	47	111	53	125	68	150
长江中游	699,700	84	120	75	107	92	131
长江下游	192,740	57	348	45	233	61	316
东南沿海 ^c	226,670	27	119	29	128	36	159
岭南 ^b	424,900	29	68	33	78	47	111
云贵	470,570	11	23	16	34	26	55
总数	3,956,300	406	103	397	100	536	135

a. 有关确立本表内的估计数的方法，参见注④

b. 包括台湾。如不计台湾在内，其相应数字为：面积190710平方公里；1843年人口数26百万；1843年人口密度为136；1893年人口数26百万；1893年人口密度为136；1953年人口数29百万；1953年人口密度为152。

c. 包括海南岛

系统的等级》一文中所述，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生态过程（即一方面是因水土流失而引起肥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则是灌溉和人工施肥）都提高了地势低平的区域核心地区的农业产量。地图1标出了除满洲之外各个区域的资源集中的地区，图中阴影处为各区域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人们会注意到，除云贵之外，这些区域的“核心”均为河谷低地，河谷低地同边缘地区相比顺理成章，享有绝大部分的交通方便。由于同陆运相比，水运成本低廉，因而除了云贵和西北，可通航的水路在贸易流中占据了主宰地位。即便在河流不可通航的地区，河谷也是最便捷有效的陆上路线。由此，各个区域的交通网在低的核心地区最为稠密，各种交通枢纽都座落在那里。撇开水系不谈，核心地区平坦地带使修筑道路和开凿运河都相对便宜。

由于这些原因，各区域的主要城市从核心地区或从通往核心地区的交通线上形成起来便是合乎情理的。而一自然地理区域中所有城市都形成了在位于区域核心地区的一个或几个城市中达到顶点的等级式的贸易交往模式，也是极为自然的。

由于非机械化运输工具所致的昂贵的运费及两地间势必遥远的距离，一区域中位于中心地区的城市与另一区域中位于中心地区的城市间的贸易量被缩小到最低程度。用役畜驮运粮食，每走二百英里，其运输成本就要翻一倍，相当于这些粮食在第一地点生产的成本。而对煤而言，其相应的数字则为25英里弱^⑤。运费的这种等差，有效地把笨重而价格低廉的商品从区域际的贸易中排挤在外。此外，我们还得把成为区域边缘大部分地区的特征的地势起伏地带所带来的运费的不断增加考虑在内，即便毗邻区域间最有利的交通路线也常常须穿过山隘和险峡^⑥。必须强调，运输效率上系统的差异对行政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影响，不比商业交

往小，区域际的相互交往沟通在各方面都受到抑制。

随着这些总旨论点得到认可后，自然地理宏观区域^①自然便成了分析城市化的合适单位了。把相当于一个宏观区域的一部分当作分析城市化的起始单位，是从城市的相互作用网中把一个有机的整体强扭出多少有点武断的一部分来。即便这一部分是整个区域系统的区域子系统，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核心——边缘的结构是由整个区域系统产生的，而非源自于这个系统的某一部分。例如，长江中游区域可以进一步划为长江走廊及四条主要支流的流域等五个次区域，但整个长江中游区域的核心地区大部分都位于长江走廊及汉水流域之中，而其它次区域则大部或全部系边缘地区。武汉发挥的是整个区域的中心都会的作用，而并非仅仅是所踞的长江走廊的中心都会。而该走廊中另外两个主要城市——九江府和沙市——的中心作用也延伸入一个或几个相邻的次区域之中。由此，汉水流域（或其它流域）的低城市化率同长江走廊高的城市化率就是该宏观区域之结构的整体性。尽管这五个次区域在规模上与东南沿海区域相埒，但没有一个能合适地与之相比，因为后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选择分析城市化单位时，选择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宏观区域的部分地域的地区，甚至比提取孤立的次单位还难以说明问题。

我们可以参照省份的情况来说明这些原则。虽然省界在几个重要地段同区域边界非常吻合，然而即便在吻合得最好处——如四川同长江上游；广东、广西同岭南——这种吻合总的来说还是很牵强的。有几个省份的边界直接与区域边界相逆，其最明显的例子是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浙江和贵州。因此，要想将各省的城市化率相比较，这在方法论上是难以说明的，适足以引入歧途，因为这里所说的各省城市化率的差异并非由作为一个系统的省份特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纯粹源于这条省界凑巧怎样

划定这一随机过程。例如，尽管我们将直隶、河南和山东作一比较，很可能显示出这三省的城市化率依次下降*。但这种差异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各省中位于华北区域各省核心地区的那个部分的相对比例之差而已。开封是十九世纪河南省的最大城市，它的腹地一直伸展到南直隶和鲁西；而济宁——鲁西主要城市——的腹地则括及河南一部分（更不必提江苏和安徽）^③。且不谈城市化，即便在描述中国城市化之空间上的不同时，从省份出发也是根本无效的。要想对浙、皖、苏三省的城市作一精确的描述，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该省内的城市分属两个区域，并因之而引起的基本区域两分（the basic regional dichotomy）着手，就是从把该省一部分据以同相邻省份毗邻部分更相似，而同本省其它部分则不那么相似的方法再现出来着手。人们从对豫、陕、黔、桂等省份的描述中可以明确，上述各个省份中各有一个特定部分座落在武汉城市群的最大腹地之中。然而，如果将这些事实按省份各自单独陈述的话，那么它们的最终意义就会湮没无闻，不易察觉。

让我最终引证两条重要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对城市化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动态分析必须要以区域为单位单独分析，而非以整个帝国为单位进行整体处理。理由之一是那些延缓中国历史发展（也包括晚清时期）的主要灾难，几乎总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洪荒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低地核心地区尤为频繁。酷旱在西北和华北的后果最为严重，而其它区域则次之。内亚游牧民族的入侵频频将西北和华北夷为废墟，而长江流域及更南的诸区域则相应难得尝到这种劫掠的滋味。内部的骚动在某一时期中，也难得给一两个以上的区域同时带来浩劫。1640年期间张献忠的

*即直隶最高，河南次之，山东低——译者注。

叛乱严重地打断了长江上游区域的发展，并引起当地人口锐减，但在长江中游区域只引起了很小的反响而已。1850年代暨1860年代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主要波及长江下游区域及长江中游区域的赣江流域一带。1860年代的回民暴动则局限在云贵及华北区域中。晚清时期其它起义中的大部，则甚至局限在狭窄的当地，更具局部性。

讽刺意味十足的是，避开从整个帝国范围来分析城市化的理由之二，是由帝国朝廷制定的重大国策，总是促进或者抑制区域间的城市循环发展，而非整个帝国的发展。北宋初年将国都由长安徙至开封，此举在促进华北的区域发展同时，恰恰也标志着西北区域的势力旁落、日臻衰退。南宋选择杭州为国都，则主要对长江下游区域范围内的城市之发展有所影响。1757年广州被特许独揽海外贸易，结果加速了岭南区域的发展，而东南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停滞，也就因此而注定了。

由此，尽管在皇朝的鼎盛时期，区域发展曲线呈现出向上摆动的趋势以与之相吻，在皇朝衰亡时期及朝代交替时的动乱时期，曲线总往下摆以与之相合，但不同区域的发展周期各有其自己与众不同的节奏^⑧。与此相应的一点是，各区域内经济发展和萧条的周期、城市发展和衰退的周期、人口增长和衰减的周期都是密切相互关联着。我们可以给较发达的区域经济下如下定义：较发达的地区经济是由该经济体系内地区性的特产、各种职业组成的职业结构、信贷的等级系统共同支撑着的区域内贸易；在经济体系中，人们通过无数不断增加的投资决定将当时最普遍的技术应用于区域范围的纯社会性工程（如道路、桥梁、运河、水渠及灌溉工程），并在这些工程中表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⑨。在区域发展周期曲线向上摆动时期内，上述发展不可分离地同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即特定城市规模的增长，同新的中心地的兴